

对修辞方法的挑战与整合

——“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认知方法述评

尚必武

内容提要 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论题，不可靠叙述引发了当下叙事学界最热烈的讨论。认知叙事学的崛起打破了修辞方法在该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挑战修辞方法的同时，部分认知叙事学家又对修辞方法加以整合，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认知 - 修辞”综合方法，但综合的结果使得一种方法压倒了另一种方法，最终导致综合的努力归于失败。

关键词 不可靠叙述 修辞方法 认知方法 挑战 整合

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中心论题”，“不可靠叙述”引发了“当下叙事学界最热烈的讨论”。长期以来，韦恩·布斯开创的修辞方法一直被奉为不可靠叙述研究之圭臬。尤其是经过西摩·查特曼和詹姆斯·费伦等人的不断修正与发展，修辞方法更是牢牢占据了其在西方叙事学界的强势地位，成为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主导范式。直至20世纪80、90年代，认知叙事学的崛起才打破了修辞方法在这一课题上一统天下的格局。以塔马·雅克比、A. 纽宁、V. 纽宁、布鲁诺·茨维克、佩尔·克罗格·汉森等为代表的认知叙事学家大胆地挑战和整合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掀起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热潮。

本文主要从读者的整合机制、阐释策略等角度出发，审视不可靠叙述研究认知方法的发端、塑形及其历史文化维度，希望由此把握认知方法对修辞方法的挑战与整合。不可否认，认知叙事学家试图以读者阐释策略取代作者意图的做法打开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进路，在

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修辞方法的阙如。但是，在挑战修辞方法的同时，认知方法又走向了极端，过于强调读者角色在判断不可靠叙述时所起的作用，忽略了“文本设计者”的修辞意图及其对叙事规约的影响。在修辞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阶段之后，部分认知叙事学家开始反思自己的过激立场，并结合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之长，提出了研究不可靠叙述的“认知 - 修辞”综合方法。遗憾的是，综合性的结果使得一种方法压倒了另一种方法，最终导致综合努力“归于失败”。

整合机制与认知方法的发端

上个世纪80年代，布斯开创的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布斯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定义还一度进入了国际上第一部叙事学词典的词条。但彼时，西方学界也不乏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修辞研究方法相背离的研究取向，塔马·雅克比即是一例。雅克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叙事学派”的核

心人物，长期从事不可靠叙述研究，曾以《虚构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雅克比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可靠叙述研究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这一论题不仅十分复杂，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可靠性与不可靠性是价值判断还是描述？是数据还是推测？是可分级的对比还是不可分级的对比？是自足的特征还是与其他特征紧密结合的结果？

受到《今日诗学》主编梅尔·斯滕伯格关于虚构话语是一种被激发或被整合的复杂性交际行为这一论点的影响，雅克比在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处理上引入了读者角色，把不可靠性看作是一种“阅读假设”。为了解决“文本问题”，这一假设以牺牲某种与作者相冲突的、中介的、感知的或交际的代理者为代价。在雅克比看来，不可靠性不是叙述者的“个性特征”，而是读者在语境范式下的“推测手段”。因此，“在包括阅读语境以及作者和文类框架在内的语境里视为‘可靠’的东西，在另一个语境里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甚至可以在叙述者的缺陷的范畴之外得到解释”。

雅克比认为，与虚构现实的所有层面最为相关的框架是对“文本张力”的解决。但是，文本的不一致性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读者需要利用不同的原则和机制对感知到的“张力”、“困难”、“不相容性”、“自我矛盾”、“怪异的语言”等加以整合。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雅克比不断地探索读者用以解决“文本问题”的“阅读假设”，其结果便是五种类型的“整合机制”：存在机制、功能机制、文类原则、视角或不可靠性原则、生成机制。

实际上，在这五种整合机制中，真正与不可靠叙述相关的只有一个，即“视角或不可靠性原则”，因为只有这一机制涉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及读者对不可靠性的阅读假设。但

是，雅克比所提出的整合机制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首先，整合机制在总体上探讨了读者在判断叙述不可靠性中所起的作用，尤其为不同读者对相同作品做出“相异的读解”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其次，虽然雅克比提出整合机制的本意在于解释叙事虚构作品的不可靠性，但实际上，这套整合机制对研究非虚构叙事作品（传记、回忆录）的不可靠性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申丹等人正是在借鉴整合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传记作品的不可靠性。最后，特别重要的是，雅克比关于读者的“阅读假设”对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处理与整合的观点打破了以往叙事学界一味地以修辞方法阐释不可靠叙述的范式和惯例，为不可靠叙述研究认知方法的发端与塑形作了良好的铺垫。

认知方法的塑形：阐释策略、 文本线索、自然化

在挑战修辞方法的阵营中，最为耀眼的认知叙事学家当属德国叙事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吉森大学的A. 纽宁教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A. 纽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提出质疑，极力宣扬与修辞方法相对立的认知方法。在A. 纽宁看来，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批评家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即叙述者“同什么比较，才变得不可靠”。^①对此，修辞叙事学家的回答是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②而认知叙事学家的回答则是真实读者的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处，A. 纽宁直截了当地说：“不可靠不是相对于隐含作者的范式和价值而言，而是相对于读者或批评家对世界的概念知识而言。”^③

众所周知，“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的基石。但是，在A. 纽宁看来，这一概念“定义不准，且模糊不清”、“毫无用处”、“概念模糊，存有问题”、“定

义不准,存有悖谬”。^①按照 A. 纽宁的说法,既然不可靠叙述“依赖的是定义不准、难以捉摸的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这就使得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缺乏一个可以信赖的标准”。^②A. 纽宁对隐含作者的彻底否定无异于对修辞方法进行釜底抽薪的解构。

在解构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之后,A. 纽宁转而使用认知方法来重构不可靠叙述理论。A. 纽宁认为:“叙述者不可靠性的辨别不单单依赖于批评家的直觉。文本的不一致性、叙述者的言语行为、文本的虚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知识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异等,都为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提供了基础。”^③由此可以看出 A. 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研究认知建构的三个步骤:(1)确定读者是判断不可靠叙述的主体;(2)甄别不可靠叙述的“文本线索”;(3)在框架理论语境下,读者对“文本线索”的“自然化”。^④实际上,这三个步骤所强调的是文本因素与读者认知过程的互动,即文本线索揭示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概念框架则把模糊的、不一致的、矛盾的文本线索自然化为不可靠叙述。

A. 纽宁说:“我们不能从文本的结构方面或语义方面来界定不可靠叙述,而只能从读者带入文本的概念框架的角度来考量。”^⑤他认为:“读者解决文本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的策略是把它们都归因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读者投射的概念框架语境下,概念化不可靠叙述是比较充分的。在概念框架语境下,不可靠叙述者的使用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即我们所知道的自然化。”^⑥由此,A. 纽宁把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主体从隐含作者转移到真实读者。

那么读者如何在叙事文本中辨别不可靠叙述呢?在参照了苏珊·兰瑟、施劳米什·里蒙·凯南、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凯瑟琳·沃尔等论者关于不可靠叙述的“文本线索”的基础上,^⑦A. 纽宁列举了一系列标记不可靠叙述的“文本线索”:叙述者叙述话语的内在矛盾或叙述者言

行的一致、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阐释之间的冲突或不一致、叙述者个人的言语习惯(不遵守语言规范,使用感叹句、省略句)、对同一事件进行多重视角的叙述、超文本符号(标题、副标题、前言等)的使用。^⑧

但读者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不仅仅依赖于文本线索,而且还借助于文本外的参照框架。在捕捉到上述文本线索后,读者会启动“自然化”的阐释策略。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读者把文本线索所揭示出的矛盾、冲突、不一致等归因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⑨A. 纽宁认为,读者大致借助于如下十个“参照框架”来自然化不可靠叙述:(1)一般的世界知识;(2)历史世界模型与文化符码;(3)显性的人格化理论与隐性的心理整合和人类行为模型;(4)对特定时期的社会、道德、语言规范的了解;(5)读者个人的知识、心理特征;(6)一般的文学规约;(7)文类规约与模型;(8)文类与文体框架的范式;(9)参照前文本的互文框架;(10)具体文本所建立的结构与范式。^⑩实际上,前五个参照框架与读者的“实际经验”密切相关,后五个参照框架与读者所掌握的“文学规约”知识,即“文学参照框架”相关。

作为不可靠叙述研究认知方法的集大成者,A. 纽宁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升了读者的角色,强调读者在判断不可靠叙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成功地把“认知注意力”引至读者在辨别不可靠叙述时所起的作用上,为研究叙述行为开辟了重要的新视角”。^⑪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研究是富有意义的”。^⑫但是,在解构经典修辞方法的同时,A. 纽宁似乎走向了极端,过于单方面地夸大了读者的作用,即“纯粹以读者责任为取向的研究”,“忽略了不可靠叙述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这一事实”。^⑬因此,在修辞叙事学出现后经典转向之后,A. 纽宁开始反思自己的激进立场,进而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综合方法——“认知-修辞”方法。此外,A. 纽宁还特别强调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语境框

架,而任何语境框架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便使得认知方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维度。

认知方法的历史文化维度: 对不可靠叙述史的历时建构

A. 纽宁曾在不同场合指出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其中包括:书写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的发展史、审视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的发展及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具体的接受等。^② A. 纽宁以身作则,他不仅试图整合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而且还尝试性地探索了“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在英国小说史上的发展与流变。A. 纽宁认为,不可靠叙述手法的出现并非现代小说的专利,而是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是,不可靠叙述的真正源头不是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理查森、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等小说名家笔下的作品,因为笛福等人努力建构叙述者的可靠性,而不是削弱叙述者的权威。在A. 纽宁看来,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 1800)是英国小说史上较早使用不可靠叙述技法的作品。在19世纪初,现实主义小说大行其道,一时间成为文学样式的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力图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世界,在这种文学生产语境下,不可靠叙述这一技法无疑被边缘化了。但是,期间也并不排除成功使用不可靠叙述手法的作品,如艾米莉·勃朗台的《呼啸山庄》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英国小说从维多利亚时期向现代主义时期转型的过渡期。此间,使用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的小说开始大量涌现。亨利·詹姆斯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詹姆斯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使用不可靠叙述技法的作品,如《阿斯本文稿》《旋转的螺丝》等。除了詹姆斯的作品外,同时期使用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的小说还有伯吉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爷》,以及迈多克斯·福特的《好兵》等。

A. 纽宁以为,英国小说中不可靠叙述技法的滥觞是在二战以后。很多当代作家不再刻画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而是聚焦于各种偏离正常范式的行为,如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威廉·戈尔丁的《自由落体》、马丁·艾米斯的《钱》、朱莉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安东尼·伯吉斯的《人间幽灵》、尼尔·威廉的《星球的转向》、威廉·博伊德的《新的忏悔》、珍妮特·温特森的《性感的樱桃》等。按照沃尔的说法,不可靠叙述解构了真实的概念,甚至挑战了人们对“可靠的”与“不可靠的”所作的区分。^③

在A. 纽宁看来,无论是作为叙事技巧的不可靠叙述,还是作为文化参照框架的范式和价值,都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因此,不可靠叙述的总体概念需要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被审视和历史化。^④ A. 纽宁的这一论点得到了另一位认知叙事学家布鲁诺·茨维克的认同。茨维克认为,既然对于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判断涉及阐释选择和阐释策略,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就会随着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认知转向”是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第一次范式转移,而在认知转向之后,不可靠叙述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范式转移——“历史文化转向”。^⑤

茨维克首先提出了在历史文化语境下分析不可靠叙述所涉及的四个共时性命题:(1)不可靠叙述只能发生在个性化的叙述情境中,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不可靠的叙述者必须被“个性化”;(2)个性化叙述者的非意图式“自我指控”是不可靠叙述的必要条件;(3)不可靠叙述是由文化决定的现象;(4)作为一个阅读策略,不可靠叙述是由历史决定的现象。茨维克特别指出,最后两个命题凸显了不可靠叙述研究之“历史文化转向”的必要性,只有把不可靠叙述看作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并对此加以系统地历史化,以其不同形式和功能为基础的不可靠叙述史的书写才成为可能。^⑥

与在历史文化语境下分析不可靠叙述的四

个共时性命题相对,茨维克又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史的四个历时性命题。^②

(1)在小说语境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可靠叙述者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现实主义小说阵营。茨维克以为,对社会范式的现实再现是不可靠叙述的历史前提,只有在叙事的现实主义范式背景下,不可靠叙述才可以被辨别出来,因为不可靠叙述者的存在需要依赖其对立面对面——讲述虚构事件的可靠叙述者。茨维克与A.纽宁持有相似论点,认为在英国小说史上,最早使用不可靠叙述的作品是玛丽亚·埃奇沃斯的《拉克伦特堡》,该小说叙述者泰迪·夸克的不可靠性是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委婉讽刺和批判。

(2)除通俗文类之外,不可靠叙述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没有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很少使用不可靠叙述,人们也没有对这一时期的作品再现虚构世界的现实主义范式产生过怀疑。只是在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感伤小说等)中,不可靠叙述者才频频出现,如威尔基·柯林斯的《白衣女人》、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等。

(3)随着日益增长的认识论怀疑,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型时期,不可靠叙述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折射了该时期由认识怀疑论主导的文化话语。这一时期的小说叙述者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自己的不可靠性,如亨利·詹姆斯的《阿斯本文稿》和《旋转的螺丝》、康拉德的《吉姆爷》、福特的《好兵》、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等。

(4)就不可靠叙述而言,二战后的小说主要有三大发展:由不可靠叙述主导的战后小说削弱了现存的(不)可靠性的现实主义理念;一些后现代主义文本可以、但不一定非要通过不可靠叙述来加以自然化;就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而言,不可靠叙述不再是自然化过程的一个可选项。

在茨维克看来,不可靠叙述是读者阐释策略的结果,而阐释策略又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靠叙述的历史文化属性决定了对这一现象加以历史化的必要性。^③除了A.纽宁和茨维克之外,西方还有另一位认知叙事学家V.纽宁也强调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历史文化因素,甚至还据此提出了“历史-文化叙事学”(cultural-historical narratology)这一术语。但是,与A.纽宁和茨维克不同的是,V.纽宁的旨趣不在于考察不同历史文化时期的作品对不可靠叙述手法的使用,而是着力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同一部作品的叙述者为何呈现出由“可靠性”向“不可靠性”的变化。

V.纽宁以哥尔斯密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为个案,详细考辨了批评界对叙述者普里姆里斯牧师的接受历程,即普里姆里斯从可靠性到不可靠性的变化。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批评界普遍认为普里姆里斯是可靠的叙述者,但在20世纪,批评气候发生逆转,很多批评家都把普里姆里斯看成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V.纽宁认为,对于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而言,读者的价值和范式体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读者的知识和价值影响其对文本结构意义的重构;另一方面,读者对文本总体结构的感知与其伦理信念之间的冲突会促使他把某些叙述者阐释成不可靠的叙述者。因此,价值和范式的历史变化会严重影响读者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④由此就不难理解,叙述者普里姆里斯为何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由“可靠性”到“不可靠性”的变化。读者如果把小说解读成连贯性的整体,发现文本不存在重大的不一致性,则认为普里姆里斯是可靠的叙述者;反之,读者如果发现普里姆里斯的价值观与文本展现出的价值观存在重大的冲突,则认为他是不可靠的叙述者。换言之,对普里姆里斯是否可靠的判断取决于两个因素:读者对文本结构意义的不同重构;结构意义对读者价值体系的偏离。

通过对叙述者普里姆里斯的接受史的整理

与分析, V. 纽宁得出结论:只有考虑到意义建构的历史变化性和作品创作时期的价值观念,对不可靠叙述的叙事学分析才站得住脚,也才有价值。³⁵ V. 纽宁的结论在另一位论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史上很多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后来又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原因并不在于早期解读的错误性,而是因为后来的读者与早期的读者拥有不同的范式和价值观念。”³⁶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 A. 纽宁与茨维克对不可靠叙述史的整体性考察,还是 V. 纽宁对不可靠叙述者接受史的个案研究,都体现了认知方法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修辞方法的阙略。

可贵的综合努力: “认知 - 修辞”方法

通过对 A. 纽宁一系列论著的细读,不难发现, A. 纽宁所竭力反对和解构的乃是布斯所界定的隐含作者——即经典叙事学语境下的隐含作者——概念。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 A. 纽宁曾建议用“结构整体”来替代布斯的隐含作者,并大谈废弃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或对隐含作者重新概念化的必要与好处。³⁷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修辞叙事学从布斯主导的经典阶段转向由詹姆斯·费伦为旗手的后经典阶段之后,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后经典修辞方法又使得 A. 纽宁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立场。

A. 纽宁对费伦的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后经典修辞方法赞赏有加。A. 纽宁认为:(1)费伦关于不可靠叙述预设了某种修辞叙事交流,以及假定作者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设计文本,从而实现共享意义、信仰、态度、价值规范的交流等观点是令人信服的;(2)费伦的修辞方法可以更好地说明读者与作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能以各种方式共享见解、价值观和信仰,进而为研究叙事伦理打开了新进路。³⁸此外, A. 纽宁还接受了费伦对认知方法的批判,即:那些对不可靠叙述持激进立场的认知理论家没有认识

到,多重阐释的限制不仅来自于文本和阅读规约,而且还来自于文本的设计者(隐含作者)。³⁹但同时, A. 纽宁也指出了修辞方法的先天不足,认为它不能对如何识别不可靠叙述者提供满意的答案。⁴⁰

A. 纽宁由此对自己先前激进的认知立场加以反思,对后经典的修辞方法加以重新审视:一方面,肯定了认知方法的积极作用,即读者的参照框架对“自然化”不可靠叙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借鉴了修辞叙事学关于修辞交流的思想,尤其是“隐含作者”的新定义对于文本设计的意义。在综合考虑了“读者的角色”、“文本的角色”以及“作者的角色”之后,他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综合方法——“认知 - 修辞”方法。按照这一方法,判断一个叙述者是否可靠,“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建立的、作者代理设计的结构和规范以及读者的知识、心理状况和价值规范系统”。⁴¹在此之前,认知叙事学家过分夸大了“读者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不可靠性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中。A. 纽宁曾说:“一个叙述者是否可靠不是取决于隐含作者的范式价值与叙述者的范式价值之间的差距,而是取决于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⁴²

但是,在提出“认知 - 修辞”方法之后, A. 纽宁激进的认知立场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时隔六年,他在《重构“不可靠叙述”概念: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一文中指出,“一个叙述者是否可靠不但取决于叙述者的范式价值与整个文本(或隐含作者)之间的差距,而且取决于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当然,这些范式标准本身又是不断变化的。”⁴³两相比较,明显的变化是 A. 纽宁把先前的“不是……而是……”换成了现在的“不但……而且……”。这一变化表明, A. 纽宁开始重视“隐含作者”在判断“不可靠叙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只不过此处的“隐含作者”是经过费伦重新界定后的概念。

A. 纽宁以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他们到了死了》为例,来说明“认知-修辞”方法对不可靠叙述分析实践的重要意义。A. 纽宁以为,把认知方法和修辞方法综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帮助批评家回答在分析不可靠叙述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样的文本和语境信号向读者暗示叙述者的可靠性值得怀疑?隐含作者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叙述者的话语和文本露出线索,从而使批评家知道他遇到了不可靠叙述者?上述问题集中到一点便是:如何辨别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通过综合运用认知方法和修辞方法,A. 纽宁得出结论:对不可靠叙述者的映射不仅仅依赖于读者的参照框架和阅读规约,因为读者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认知处理方式也受到文本及其设计者(隐含作者)的多重约束。修辞方法使认知叙事学家认识到,对不可靠叙述者的映射预设了一个创造者性质的代理者的存在,为了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和他对这种不可靠性的自我揭露,这个代理者给文本和叙述者设计了显性的文本记号和“推断邀请”。^④

在西方叙事学界,试图综合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之洞见来研究不可靠叙述的论者并非A. 纽宁一人。丹麦叙事学家佩尔·克罗格·汉森即是一例。虽然出身于认知叙事学阵营,汉森近年来也积极探索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认知-修辞”方法。^⑤汉森认为,过去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基本上问的都是“或是……,或是……”的问题,而不是他所建议的“既是……,也是……”的问题。批评家关注的是由“什么”和由“谁”来判断不可靠性。对此,布斯使用了隐含作者,查特曼使用了隐含读者,A. 纽宁则使用了真实读者。他们既对也错:在对不可靠叙述的辨别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把判断不可靠性简单地归因于某个单一因素,他们又是错误的。^⑥

在对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加以批判和整合的基础上,汉森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

间不可靠性、文本外不可靠性。^⑦

(1)叙述内不可靠性是指有很多的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起来的不可靠性,类似于沃尔所说的“话语标记”,即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地方所加的插入语和评论,以及一些没有解决的自我矛盾。例如,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世密的心》中,叙述者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性辩护,但他所参照的情景和行为模式明显暴露出他的疯狂。

(2)叙述间不可靠性是指一个叙述者所报道的事件与另一个或其他几个叙述者所报道的事件相反的情况。与叙述内不可靠性形成对照,叙述间不可靠性不一定会在不可靠叙述者的话语上留下话语标记,而是存在于其他叙述声音的框架之中。例如,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愤怒》即是如此,在同全知叙述者戴维丝的叙述相比较的时候,小说的第三个叙述者(杰森·康布森)的不可靠性被更为清晰地暴露出来。

(3)文本间不可靠性依赖于对人物类型的展示,这些人物凭借自己先前的存在、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例如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的隽语、托马斯·曼的流浪汉小说《弗里克斯·克鲁尔的自供》的标题),将读者的注意力引至自己的不可靠性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会有很多的人物类型,读者通过具体的、可辨别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可靠的人物类型来辨别人物叙述者,这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寻找这些因素。

(4)文本外不可靠性依赖于读者直接在文本世界中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事实与虚构的冲突表现得最为突出。

那么,这四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汉森看来,四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通常会在同一个文本中共同起作用,因此不可靠性在叙述者的话语内得到显现,通过其他叙述者的讲述得到显现,通过叙述者所基于的人物类型得到显现,也在与把知识带入文本的读者的关系中得到显现。^⑧

纵观 A. 纽宁和汉森对“认知 - 修辞”方法的综合建构,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谬与尴尬。虽然两人都认为单个方法具有缺陷和不足,提倡认知与修辞方法的整合,但是 A. 纽宁的综合方法实际上使得修辞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凸显了在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认知处理方面文本及其设计者(隐含作者)对读者的多重约束,认定不可靠叙述是隐含作者的修辞策略。也即是说,A. 纽宁的综合方法本质上是修辞的。汉森所论述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无一例外地都以读者判断为主体,使得认知方法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也即是说,汉森的综合方法本质上是认知的。由此可见,综合的结果使得一种方法压倒了另一种方法。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申丹得出结论说,任何综合“认知 - 修辞”方法的努力都注定“归于失败”。^⑩

但是,不能将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加以综合,这并不排除两者的互补性。^⑪例如,认知方法可以揭示出读者的阐释框架或阅读假设,为辨识不可靠的叙述者提供更为精细的工具,弥补了修辞方法的不足。另一方面,修辞方法可以从隐含作者的规范和文本的设计意图出发,为解释文本的不一致性等问题提供可资参照的路径,弥补了认知方法一味依赖读者阐释框架的缺陷。由此,可以进一步从文本内外两个方面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不可靠叙述。

注释:

Monika Fludemik, "Fiction vs Non-Fiction: Narra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in Joerg Helbig ed., *Erzaehlen und Erzaehltheorie in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uer Wilhelm Fueger* (Heidelberg: Universitaetsverlag C., 2001), p. 98.

^{②⑨} ^{③⑧} ^{④①} ^{④③} ^{④④} Ansgar N. Üning, "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 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90, p. 98, pp. 99 - 100, p. 94, p. 105, p. 95, p. 104.

参见 Per Krogh Hansen, "Reconsidering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Semiotica* 165 (2007), 227页。

需要指出的是,认知 - 修辞方法的不能综合,并不表示两者不能互补。笔者先前对此认识不足,非常感谢申丹教授为我指出这一点以及她同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交流。

杰拉德·普林斯在其编撰的《叙事学词典》中,完全参考了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参见 Gerald Prince e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101页。

Tamar Yacobi, "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Communicative Problem", *Poetics Today* 2 (1981), p. 113.

关于梅尔·斯滕伯格的交际性虚构话语观,参见 Meir Sternberg, *Expositional Modes and Temporal Ordering in Fi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Meir Sternberg, "Mimesis and Motivation: The Two Faces of Fictional Coherence", in Joseph P. Strelka e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5 - 188页。

Tamar Yacobi, "Authorial Rhetoric, Narratorial Reliability (Un), Divergent Readings: Tolstoy's *Kreutzer Sonata*", 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110.

Tamar Yacobi, "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Communicative Problem", *Poetics Today* 2 (1981), pp. 113 - 126;

Tamar Yacobi, "Interart Narrative: (Un) Reliability and Ekphrasis", *Poetics Today* 21 (2000), pp. 711 - 749;

Tamar Yacobi, "Package-Deals in Fictional Narrative: The Case of the Narrator's (Un) Reliability", *Narrative* 9 (2001), pp. 223 - 229;

Tamar Yacobi, "Authorial Rhetoric, Narratorial (Un) Reliability, Divergent Readings: Tolstoy's *Kreutzer Sonata*", 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5), pp. 108 - 123.

^⑩ Dan Shen and Dejin Xu, "Intratextuality, Extra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y: Unreliability in Autobiography versus Fiction", *Poetics Today* 28 (2007), pp. 43 - 87.

^{⑪⑬} Ansgar N. Üning, "'But Why Will You Say that I am Mad?' O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Signal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British Fiction",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2 (1997), p. 86, p. 85.

^⑫ 虽然西摩·查特曼曾提出以“隐含读者的推测”(the implied reader's surmises)为基准来判定不可靠叙述,但这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因为“隐含读者的推测”对象毕竟没有脱离作品(隐含作者)的意图。参见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3 - 234页。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Ansgar N Üning, "Unreliable, Compared to What? Towar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Prolegomena and Hypotheses", in Walter Gr ün zweig & Andreas Solbach eds, *Grenz überschreitungen: Narratologien in Kontext/Transcending Boundaries: Narratology in Context* (T übingen: Gü nter Narr Verlag, 1999), p. 70, p. 53, p. 60, p. 54, pp. 64 - 65, p. 69, pp. 67 - 68, p. 61.
- ⑮ 关于纽宁对隐合作者概念的批判, 参见 Ansgar N Üning, " 'But Why Will You Say that I am Mad? ' O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Signal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British Fiction",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2 (1997), 85页; Ansgar N Üning,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ed Author: The Implied Author—Still a Subject of Debate", *Anglistik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 8 (1997), 109页; Ansgar N Üning, "Unreliable Narrator", in Paul E. Schellinger ed., *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 Vol. 2 (Chicago an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1998), 1387页; Ansgar N Üning, "Unreliable, Compared to What? Towar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Prolegomena and Hypotheses", in Walter Gr ün zweig & Andreas Solbach eds, *Grenz überschreitungen: Narratologien in Kontext/Transcending Boundaries: Narratology in Context*, 56页。
- ⑰ 乔纳森·卡勒最先提出了“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这一术语。在《结构主义诗学》一书中,卡勒说:“自然化一个文本就是要把它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参见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5), 135页。
- ⑳ 关于揭示不可靠叙述的文本线索的论述, 参见 Susan Sniader Lanser, *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9 - 172页;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100页; Monika Fludemik, *The Fictions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s of Fiction: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and Conscious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227 - 279页; Kathleen Wal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ori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4 (1994), 18 - 42页。
- ㉒⑳㉓㉔ Per Krogh Hansen, "Reconsidering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Semiotica* 165 (2007), p. 228, p. 228, p. 240, p. 244, pp. 243 - 244.
- ㉕ Per Krogh Hansen, "Unreliable Narration between Author's Intentions and Readers'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Per Krogh Hansen ed., *Linguistics, Cognition, and Narrative* (Holte: Forlaget Medusa, 2010, forthcoming).
- ㉖ Ansgar N Üning, " 'But Why Will You Say that I am Mad? ' O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Signal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British Fiction",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2 (1997), p. 102; Ansgar N Üning, "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 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p. 195.
- ㉗ Kathleen Wal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ori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4 (1994), pp. 18 - 42.
- ㉘㉙㉚㉛ Bruno Zerweck,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 *Style* 35 (2001), p. 151, pp. 155 - 159, pp. 159 - 167, p. 167.
- ㉜㉝ Vera N Ün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Values and Norms: The Vicar of Wakefield as a Test Case of Cultural-Historical Narratology", *Style* 38 (2004), p. 238, p. 248.
- ㉞ Ansgar N Üning,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ed Author: The Implied Author—Still a Subject of Debate", *Anglistik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 8 (1997), p. 115.
- ㉟ 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8.
- ㊱ 在2008年4月22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汉森说:“我正努力综合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在两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因为在我看来,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显得过于狭隘。”
- ㊲ Per Krogh Hansen, "When Facts Become Fiction: On Extra-Textual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Skalin ed., *Fact and Fiction in Narrativ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Örebro: Örebro University, 2005), pp. 283 - 307; Per Krogh Hansen, "Reconsidering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Semiotica* 165 (2007), pp. 227 - 246; Per Krogh Hansen, "Unreliable Narration between Author's Intentions and Readers'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Per Krogh Hansen ed.,

Linguistics, Cognition, and Narrative

④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133-143页。

⑤ 关于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参见尚必武：《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与互补性》，载《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27-34页。

Challenging and Integrating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A Review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Unreliable Narration

SHANG Biwu

Abstract: As a central issue of narrative studies, unreliable narration is among the most discussed in current narratology. With the rise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 the dominant rhetorical approach to unreliable narration has met its due challenge. Apart from challenging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some cognitive narratologists try to integrate it, propos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i.e. the cognitive-rhetorical approach. However,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is doomed to failure owing to its imbalanced emphasis upon either the cognitive or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Key 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 rhetorical approach, cognitive approach, challenge, integration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 锋